

共处的代价是什么？

为西方联盟制定的一项政策

約翰·斯萊瑟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共处的代价是什么？

为西方联盟制定的一项政策

英国皇家空军元帅 約翰·斯萊瑟著

洪 云 譯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Marshal of the Royal Air Force

JOHN SLESSOR

WHAT PRICE COEXISTENCE?

A Policy for the Western Alliance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New York, 1961

根据紐約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社1961年版譯出

· 內部讀物 ·

共处的代价是什么？

为西方联盟制定的一项政策

英国皇家空軍元帥 約翰·斯萊瑟著

洪 云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55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4 \frac{1}{8}$ · 字数 93,000

1963年12月第一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698

目 录

第一章	目的	1
第二章	了解你的敌人	10
第三章	一些基本原则	23
第四章	裁軍——臆想和现实	36
第五章	国内战綫	48
第六章	在欧洲的首要步驟	60
第七章	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制定的一項新計劃	72
第八章	欧洲軍备监督和政治調整的首要步驟	84
第九章	全球战略	95
第十章	殖民主义——美国的固执之見	106
第十一章	中东、远东和非洲的西方战略	113
結束語	——柏林問題	125

第一章 目 的

它指示了什么？

——福煦元帅^①

在英国的作战部队——以及无疑地在其他国家的作战部队——，军官们所受的教育，包括讲授如何对某一特定军事局面的各种有关因素作出估计，由此导致采择一个行动计划。

在这本书的主要篇幅中，我不打算对今天的世界军事局面提供任何全面的估计。我所准备做的，只是对我们在当代广泛的世俗革命中这一相当重要的阶段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政治和战略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看来可以从确定目的^②来开始（就如同在参谋学院所学的那样）：我们想干什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总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用福煦元帅的话来说，de quoi s'agit il（它指示了什么）？

用这种方式来开头，当然是普通常识。但是，根据我在各级职位上写估计的相当长期的经验，也有这种并非少有的情况：要末把第一段即关于目的那一段完全略去，要末把目的确定得不对头，以致随后所考虑的要达到此目的的方案——也就是行

① 法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译者

② 在这本书里，“目的”(object)和“目标”(objective)这两个字眼是按照《牛津简明字典》的解释而使用的。“目的”是指政策或意图……；“目标”则有比较局限的意义……。因此在(1944年)盟军登陆法国的战役中，目的就是要把欧洲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其第一个目标则是夺取诺曼第滩头。

动計劃——就不精确或不全面。

人們不能輕易用“历史的轉折点”这类詞句。在过去二十年中，人們經常听到說什么今后六个月（或今后二十四小时，或今后一年）将是危急时期。事实上，在这种日子和这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是危急时期；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可輕率从事。但是，当我写此数句之际（1961年的头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們有特殊的机会和很好的理由来采取坚决的行动。我們看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紀元；我們听到共产党人在他們的1960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上，公开宣布要在“和平共处”的代号下加强冷战；大西洋理事会^①已指定它的专职工作人員重新估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欧洲的战略和为了使这种战略有效需用什么武器；有迹象表明，在裁軍的实际措施方面，将会采取新的步驟以便从分歧的丛林中开出一条道来。

因此，这看来对西方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以重新研究战略，研究一下过去十年的战略把我們引到了什么地方，并寻找为我們指明今后十年所要走的道路的路标。

我們必須首先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何在，然后才能启程。我們知道要到达目的地将需要一大段时间；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旅行的方向，了解所要跨越的障碍，至少要把长途旅程中的第一个落脚点安排好，以便在那里可以重新勘察到达目的地之前的地形。在进行这种勘察的时候，也不必想得太远。我們必須明确——并且同我們的旅伴取得一致——要达到哪一点。如果我們一开始就打算把整个路程連細節都給規定好，那末就容易把前途的障碍看成是巨大到使我們根本就不敢启程；同时这也容易使我們忘記，一旦我們到达第一个关口，从那里居高临下所看

^① 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長理事会。——譯者

到的境地，可能和原来所設想的很不相同。

在丟开以旅行作譬喻之前，我應該讲明白，当我說“我們”的时候，我是指整个旅行队，不仅仅是指任何单独的成員，不仅仅是英国或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而是指西方全体自由国家，特別是指那些結成同盟的国家。当我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問題的主要中心的时候，我并不是低估其他区域性条約組織的重要性。欧洲远不是冷战的唯一地区，但是它是內堡，是保藏自由的所在——如果欧洲丢了，一切都完了。

所以，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我們的目的。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軍事政策，而照老一套的說法，战略和政策是不能割裂的。关于战争是政策的繼續这一旧观点，容易使人迷惑。战争与其說是政策的繼續，还不如說是一种把政策付諸实现的方法。我认为在現時把这一点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的确，过去有些国家（附帶提一笔，俄国并非其中之一）是把战争提高到宗教的地位，把战争本身当成是值得想望的东西；其中突出的当然是旧德国，它也的确为武力所毀。如果对政策的定义“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方針”^①作最狹义的理解，那末我想可以把战争本身当作一种政策。但是任何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方針时，总有一种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想法；沒有这种想法，任何行动方針都是无意义的。在和平时期，是用外交，用政治的和經济的行动，用条約和貿易協議，用宣傳和顛复，甚至用隱含的武力威胁，来实现政策的目的；一般說来，只有当这些办法都失敗了，一个政府才依靠战争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也应该承认有例外，在强国和弱国之間发生的、对侵略者并无任何严重后果的小战争，就并不尽然。比如，美国政府在西班牙和美国之間的战争中，英屬印度政府在1839

① 見《牛津簡明字典》。

年的阿富汗戰爭中，就不是如此的。但是這些戰爭，雖然無可原諒，而按過去時代的道德風氣，却是可以理解的。一般的情況是，當牽涉到兩個強大的國家或集團時，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不訴諸戰爭就可以達到其政治目的的話，就不會用公開的戰爭——進犯、轟炸和封鎖——去代替非戰爭手段的壓力。俾斯麥，德皇威廉，甚至連希特勒在內，如果他們認為可以用除掉戰爭以外的手段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也不會去使用可怖的戰爭解決手段。他們所需要的，也就是那往往把政策引到戰爭去的政治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或者在世界的一部分，製造出一種他們認為對自己更有利的形勢。可以這樣說，一個政府要通過戰爭來實行其政策的願望，是同它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對自己有多大好處的程度，成正比例的。

堅持這樣一個觀點，看來似乎是賣弄學問，但是這在六十年代的世界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觀點。在過去，沒有一個政府把戰爭作為政策的工具，除非它認為（不管是對或錯）有相當把握可以取勝。而贏得一場戰爭，對任何一方說來，就意味着不僅僅是強迫敵人放下武器和接受條款，而且是成功地創造出比假如沒有這一場戰爭時的形勢更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在過去的日子里，那種野心是可以實現的，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整個說來，採取如下的觀點並不是很危險的：可以在犧牲別人而自己又出得起代價的條件下創造出所需要的形勢。今天，在一個被現代交通工具縮成為像古希臘城邦時代的空間一樣的世界中，在由於氫彈的存在而提出了幾乎是全球毀滅的可能性的世界中，實現那種野心就是不再可能的了。就上述“贏得一場戰爭”的定義來說，今天任何人都沒有任何可能了。

在這裡我必須離開本題來強調一下，上述定義既對侵略者適用也對被侵略者適用，假定後者在遇到侵略時認為唯一的辦

法就是接受不可容忍的条款。的确，在一場战争后，生活——或者所能剩下來的任何生活——的条件很难被当作是可以容忍的。正是因为这样，民主国家中有人（共产主义集团中可能也有这样的人，虽然他們不能自由表示出来）公开宣称，他們认为任何东西，即使是向核讹詐低头求饒和被共产党敌人占領，也比核战争好。这些人，或者其中一部分，无疑是真誠的，他們的观点，即使不受尊敬，至少也应该被理解。但是我不贊成这种观点，我也不相信他們的同胞中会有多少人贊成这种观点。我不打算对此进行爭論。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人的个人良心問題，是扎根于思想深处、并非我在本书所能說的任何話所能改变得了的东西。

由于我认为在任何将来的战争中不会有上面所說的那种胜利，我从 1953 年起，就屡次表明，只要双方都拥有核威懾，就不会有人再把总体战当作政策的工具。在同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冷战的对手中的任何一方，也极不可能在它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上或推行的程度上，使得总体战的可能性变成真正的危險。但是人們必須承认，——根据我将在后面闡述的理由——由于狂热、偶发事件或估計錯誤，或者由于任何一方的过度的恐惧，总体战的危險也不是不可想像的。而且，我們不能把一种无定期延續的状态当作政策的目的；在这种状态下，现代科学所具有的促进人类幸福和进步的巨大可能性，仅仅依靠恐怖的均势才得以保住，并且是和它的毁灭人类的同等可能性并存的。簡單說來，我們今天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无可理解，我們必須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

随之而來的必然是，我們的最終目标必須包括消除战争的原因和建立各国之間的永久和平。当然这是一种响亮的濫調。但是让我就此申述一下。如同我已經暗示的，这并不意味着无

条件的和平。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裁军，更不要说是西方单方面裁军，那是赤裸裸的发疯。这并不意味着那种看来是有些人的理想——单纯解除核毁灭的可能性；真正废除核武器，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可以再次对侵略者更有利而已。事实上，即使把核军备搁在一边，把核储存毁掉，——我相信在对分裂着世界的紧张局势作出持久的政治安排之前，这是完全不实际的——，难道任何人能够认真地相信，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进行另一次长期战争时，作战双方不会重新把核军备放回自己的武库中吗？在过去五十年中我打过两次“常规的”世界战争，我对于要面对第三次战争的可能性毫无兴趣；如果真的爆发了，要是设想这场战争会以一种一直被称为“非灾难性的”方式持续到超过一个有限的时期，在我看来是异想天开。

那末怎么办？理想家可以去梦想狮子和小羊躺在一起。理想主义并不错；只要理想家们眼神不乱，脚踏实地，理想主义也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是，政治是讲求可能的，我们至多只能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出现一种可以容忍的和平共处形式，一种真正的共处，而不是共产党人所想的那种不流血的共产主义胜利（不流血，只是就共产党人而言）。不同国家和政治制度都能利用这种共处来充分发展自己，至少要互相容忍分歧，并且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利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方面进行合作。

这样一种共处状态，有一个不坏的定义，就是潘查希拉，即尼赫鲁和周恩来在理论上所遵循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不侵犯和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一个新的大西洋宪章不把五项原则和四大自由^①的混合物

① 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向国会建议制订租借法案的咨文中提出的，后来它的基本内容被采纳在大西洋宪章中。——译者

作为序言，那就差了。

但是，只要对 1960 年 12 月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宣言极其粗糙地过一下目，就可以知道所谓和平共处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纲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目的，和平共处是不完整的；只要主权被理解为允许任何一个国家保持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武装力量，那末其他四项原则就没有可能得到尊重。我们所谈论的是人，而根据人类动物的本性，除非从物质上使得各国之间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分歧，就永远不会有持久和平。这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必须包括裁军在内，而要最终保证和执行裁军，只有依靠某种形式的、具有一定职权的世界政府，其中主要一个职权就是，通过某种国际警察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政治目的。这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是一个很长期的目的。这是一个不坏的目的，只要我们把它看成是很长期的，而且一方面不是过于急躁地想用一种达到有限目标的战略去达到它，另一方面也不是过于悠然自得或涣散到不愿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达到它。但是，这个很长期的目的毕竟是大笼统和不精确，远不能把它作为不久的将来立即可用的政治和战略纲领。这是一个目的地，而不是路程中的下一个落脚点。这个广泛的概念，其本身虽然可取，终究不能代替一个实际的、进取的、有生气的行动计划。它相当于 1944 年要从纳粹统治下把欧洲解放出来的盟军目的。现在相当于诺曼第滩头的又是什么呢？^①

本书的目的可以概述如下：检定一下可能决定我们在今后十年中的战略的一些有限目标。

关于我们的目的，最后再说几句我希望能预防批评的话。

① 参阅第 1 页注②。——译者

往往有人說，我們採取這樣的或那樣的政策都是沒有用的，因為俄國人決不會同意。千萬不要讓這種論調使我們離開所要採取的任何政策。在沒有做之前，要弄清楚俄國人會不會同意，總不是容易的。無論如何，克里姆林目前的領袖們（當然他們不可能永生）決不會同意任何合理（按其他人對合理這一詞的理解）的東西，除非他們為時勢所逼，或者被說服到相信協議對他們和對別人同樣有利。他們在執行他們的政策時，從來不擔心自由世界是否會同意。他們有一個完全一貫的、明確的和高於一切的深謀遠慮的政策；他們從不違背這一政策。只要他們認為對自己合適，他們就在各種不同的時候玩弄各種不同的手段。他們擅長於製造危機來使對手神經緊張。他們可以一会儿粗魯地尋事生非，一会儿又像任何一只鴿子似地柔言細語；這是一種用互相矛盾的信號使對手茫然若失的巴甫洛夫手法。由於他們狂熱地深信共產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願意等待時機。他們的戰術有變，戰略從來不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讀十二月宣言^①才能知道他們的目的是摧毀所謂“資本主義”，建立一個受莫斯科統治的共產主義世界。他們一貫地、無情地、沒遮攔地追求這一目的，毫不注意諸如符不符合事實或者別人喜不喜歡等等微小的應予考慮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消逝，那也許會改變，我們應該經常注意並隨時響應蘇聯政策的任何真正的——不僅是策略性的——變更。而在目前，對我們必不可缺的是，我們的政策應當和克里姆林的一樣具有明確性、一貫性和遠見性，執行起來也要同樣地無情。我們不應該也不需要照抄共產主義的全部策略，但是在執行我們的戰略方面，我們是可以向他們學習些東西的。首先，我們必

① 指 1960 年的莫斯科聲明。——譯者

須重获和保持主动（我們應該承認在五十年代我們是喪失主動的），不要總是跟着他們的調子跳舞，不要提心吊膽地擔心他們下一步將干什么和我們將如何應付，而是要使他們來猜一猜我們下一步將干什么，並且強使他們也不得不去防衛他們的球門綫。正如麥克米倫首相在1960年5月的最高級會議危機以後對下院所說的：“我們必須客觀地、冷靜地注意別人說些什麼，而不要使自己退回到那有些人還記得很清楚的日子裡，在那些日子，我們一周復一周地等候外國政治家的發言，然後按照他們的不同語氣來調整我們的政策。”當我們克制自己不去玩弄“邊緣主義”這種危險的蠢事時，我們決不應該使自己被克里姆林方面所表現的“邊緣主義”牽離我們的目的。

我們必須以堅定的一貫性來執行我們的長期政策，不要使自己由於無根據地害怕刺激俄國發動戰爭而不去做我們相信合乎我們自己和其他非共產黨國家的利益的事情。但是第一個必需是要有一個政策。“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它的第二個十年中沒有一個有雄心壯志的政治目的，這個組織的用途將是不穩定的，它的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將更加緊張，它的戰略和軍事計劃將是不安定的。”^①

讓我重復斯巴克先生最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議員講話時所套用的丹東^②的話來結束這一章：“果斷，再果斷，永遠果斷，西方就得救”。

① Alastair Buchan, *NATO in the 1960's*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0).

②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治家。——譯者

第二章

了解你的敌人

当一个参谋军官写一个估计的时候，在确定了目的之后，跟着就考察同达到目的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敌人的性质和他可能采取的行动。我既无时间也无资格来对复杂多端的因素作全面的考察，而要制定一个计划以击败好斗的共产主义和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在内。但是在本章，我打算进一步阐述前一章所提出的某些论点，特别是对我认为是我们面临的威胁的真正性质，要更详细地予以论述。

现代独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把他们的纲领公布出来，纲领的内容都是非常显明的。问题是我们在自由国家的人却常常不去读它。如果我们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曾经仔细地读一读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演说和著作，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不愉快的意外了。这类预告的最近一个例子，就是1960年12月在八十个共产党会议之后从莫斯科发表的一个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臃肿的声明。它是一个坦率到惊人的冷战宣言。它甚至一点也没有用共产党人通常的口蜜腹剑的语言包起来，而是公开对西方世界和我们所主张的一切表示了不共戴天的敌意。如果有所谓明确的通告的话，这就是明确通告了关于他们立意要加紧斗争，用“和平竞赛”（这显然意味着用除了热战以外的一切可用的办法）来摧毁“资本主义”（指除了共产主义之外的任何政治制度）。假如还有人怀疑我们的对手的战略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由莫斯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鋒队”——统治的共

产主义世界，那就請他讀一讀这个文件吧。

我听到有人提到，这篇文件的强烈的交战者的口气，是由于遵从了共产主义中以北京为代表的更加好斗的一派的意見。大家都知道，虽然中国人并没有放棄把总体战作为綱領的一部分，但是无疑地为了照顾世界共产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团結”，他們在声明的措詞上就那一观点作了让步。然而，赫魯曉夫在會議之后——順便說一下，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保证要改善美苏关系的同时——，却离了譜地在一次重要的演說中宣称“和平共处……是无产階級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意即共产党人以外的任何人）之間的激烈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任何人要是仍然幻想赫先生（甚至在他 1960 年在巴黎和紐約的那种表現之后）真是一个談笑風生的小家伙，类似一个俄国的匹克威克先生^①，是一个依然具有年輕时代踢足球的那种充沛精力、有着一肚子俏皮和通俗的俄国諺語的人物；最好仔細想一想上面所引的那一句話。的确，已知的魔鬼总比未知的魔鬼好，而且要是別的人領導俄国警察国家，可能更坏。但是我們不應該相信像蒙哥馬利元帅这样出名的全球旅行家由于天真受騙而得来的那些独裁者的形象；使我們接受这些形象，显然是适合独裁者的心願的。

共产党中国当然是越来越阴森森地逼近的一种威胁（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后面将有所論及）。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公认莫斯科是先鋒队，我們也应该这样认为。决心要毁灭我們的敌人不是俄国人民，而是克里姆林宮中一群献身的革命者；我們越快地面面对现实并且直言不諱，就能越好地对付和击败他們的致命的阴谋。我用“致命的”一詞是經過深思的。根据赫魯曉夫所下

① 英国文豪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主人公，为人滑稽。——譯者

的定义，和平共处成功后的合乎邏輯和必不可免的結果將不僅是我們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被摧毀，而且是千百万男女被奴役、拷打和送命。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在貿易、科学和文化領域中，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或在安屈里（Aintree）的击劍場上，进行各式人等的和平竞赛；沒有人会担心这些，我們确实还欢迎这些。和平共处所真正意味的是階級斗争，是流血的革命，是大街上的坦克，是对政治对手的“清算”（如对納吉和馬勒特^①）——总之，就是我們这一代在十来个原先是自由的欧洲国家中所看到的那些令我們感到悲痛和羞辱的事情。

这就是好斗的共产主义的目的，为此，它已經在竭力对其他仍然自由的国家（包括我們本国）的人的思想进行心理攻击。任何有一点头脑并且不是故意閉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船塢和碼頭的不断停工；共产党領導机构的滲入工会（其所以可能，是由于很大多数正派的和忠实的工会人士的无知和漠不关心）；工厂代表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所經常組織的非正式罢工，全是为了瘫痪我們所賴以为生的貿易；《工人日报》的低能儿式的幻想，銷路更广的讀物中所慣有的那些帶破坏性的和充滿色情的廢話（其危險性也不小）；社会主义政党和像裁减核軍备运动这一类組織（以及在美国的同样的組織）中那些好心和真誠的、然而是无知和乡巴佬似的糊里糊塗的忙人——所有这一切（不管那些要对这一切負責的人知不知情，通常是不知情的），只是共产党的“白蟻战术”典型的几种表现，是莫斯科和平共处先鋒队的从內部进行破坏的行动。

① 馬勒特·帕尔（Pal Maleter），貴族出身的霍尔蒂軍官，匈牙利解放后加入民主軍队。在1956年10月的反革命叛乱初期叛国，納吉組織反革命内閣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1958年6月与納吉同时被匈牙利最高法院判处死刑。——譯者

英國內閣的一個成員在最近的一次演說中^①說：“重要的是，所有國家應該明白，共產主義是一條單行街道。只要在我們這裡繼續存在着自由，共產黨就會無情地利用選舉、言論自由、罷工、示威等權利來搞顛復；還會無情地用軍事援助、武器、金錢、甚至外國軍隊，來建立一個革命政府。

“然而，等到某些不幸的人民一下子被關在陷阱里，共產黨就用一整套軍事獨裁的機構來把自由壓制下去；如果任何外面的國家、或者流亡勢力、或者國際運動，企圖給被壓迫者任何援助或安慰——以至幫助他們逃亡——，那末馬上就會被說成是‘侵略’，國際法的全部學說（特別是其中關於獨立國家的主權原則）就會被用來使受害者繼續受奴役。看來，對付共產主義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關在門外。”

但是，我們不僅僅是在歐洲——歐洲還確實不是主要的——不得不首當其衝地承受莫斯科聲明所預告的共產黨攻勢。沒有人能夠說1960年7月以來的剛果悲慘歷史同聯合國和有些西方國家（特別是比利時）的錯誤無關；比利時要對這場悲劇負大部責任，它怯懦地、粗率地過早把權力交給一堆半開化的人，而它早先又沒有給這些人以實施獨立所必需的訓練和經驗。當然，坐在看台上批評那些造成斗牛場中血肉橫飛的人的行動是容易的。不過，這些話是可以說的：就地地道道的干壞事來說，誰都比不上俄國人和他們的剛果幫手的成績。他們做盡一切丟臉的事來破壞聯合國在剛果的機構和權力，他們在當地的活動通常是由別人出面搞的，通過土生的受莫斯科訓練的極端分子去工作，也通過那些為聯合國提供部队的所謂“不結盟的中立國”中的鄉巴佬去工作；他們派佐林在聯合國大會上（在克

① 指1961年1月31日黑爾什姆勳爵在倫敦大西洋圓桌會議上所作的開幕詞。